

XINZHONGGUO DE ZHONGSU YOUHAO HUAYU GOUJIAN

新中国的 中苏友好话语构建

(1949—1960年)

李巧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XINZHONGGUO DE ZHONGSU YOUHAO HUAYU GOUJIAN

新中国的中苏友好 话语构建

(1949—1960年)

李巧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1949—1960年)/李巧宁
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5004-6260-6

I. 新… II. 李… III. 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49~1960 IV. 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3543号

特约编辑 郭沂涟

责任校对 尹力

封面设计 王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07年7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84千字

定价 22.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责任编辑：郭沂纹
封面设计：王 华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 研究的意义	(1)
二 学术史的回顾	(3)
三 研究方法、论文框架及资料来源	(5)
四 基本概念的界定	(10)
第二章 1949 年以前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	(12)
一 文艺先行:俄苏文艺作品的译入	(13)
二 中苏文化协会与《中苏文化》	(15)
三 夺取政权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	(20)
第三章 倒向苏联老大哥一边(1949—1952 年)	(23)
一 中苏友好协会遍地开花	(23)
二 核心话语	(29)
(一)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9)
(二) “中苏同盟天下无敌”	(34)
三 渲染性的话语构建	(39)
(一) 以资本主义国家之“丑”衬托苏联之“美”	(39)
(二) 轰轰烈烈的“中苏友好月”	(43)
第四章 全面学习苏联(1953—1956 年)	(52)
一 中苏友好协会的改组	(52)

2 新中国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1949—1960年)

二 令人瞩目的中苏友好馆	(54)
三 话语主题	(58)
(一)《莫斯科——北京》	(58)
(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61)
(三)“斯大林永远不死”	(63)
四 淡化的趋势	(64)
第五章 弱化的中苏友好话语(1957—1960年)	(67)
一 中苏友好协会的收缩	(67)
二 空泛的话语	(68)
三 回避分歧	(72)
四 迅速弱化	(73)
第六章 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总体特点(1949—1960年)	
.....	(81)
一 “天下无不是的苏联”	(81)
(一) 1949—1960年的宣传制度	(81)
(二)“中苏友好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84)
二 多样性的话语构建方式	(89)
(一) 聘请苏联专家	(90)
(二) 编译、发行苏联文化成果,制作以介绍苏联为 主题的文化、艺术作品	(96)
(三) 中苏互派参观、访问团体,中国派人赴苏联作 长期或短期学习	(104)
(四) 掀起“俄语热”	(108)
(五) 举办讲座、报告、座谈和展览	(111)
(六) 利用权威人物构建中苏友好话语	(114)
(七) 组织中苏人民互相通信	(116)
三 构建活动的高度统一性	(117)

四 运作的现实性	(121)
五 逐步淡化的趋势	(125)
六 话语构建中的不良现象	(127)
第七章 针对不同阶层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	(131)
一 针对农民:集体农庄是幸福之源	(136)
(一) 农民的乐园——集体农庄	(136)
(二) 因陋就简的话语构建方式	(139)
二 针对工人:社会主义前途无比美妙	(141)
三 针对妇女:“苏联妇女是我们的榜样”	(145)
四 针对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150)
第八章 新中国构建中苏友好话语的原因	(155)
一 巩固新政权	(155)
二 建设新中国	(159)
(一) 发展社会经济	(159)
(二) 建设精神家园	(165)
三 毛泽东的政治策略	(167)
四 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姿态	(169)
第九章 1949—1960 年中苏友好话语构建发展变化	
的原因	(171)
一 国内建设情况和中苏关系的变化	(171)
二 毛泽东的政治个性	(174)
第十章 中苏友好话语构建活动的影响	(183)
一 普遍的认同	(183)
二 有限的怀疑	(200)
参考文献	(212)
后记	(229)

第一章

导 论

一 研究的意义

自近代以来，中国为了求存、图强，一直寻求向外国学习，并在国内构建关于某种外国文化之先进性的话语。然而，把这种话语构建推向极致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1960年，中国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构建了一整套中苏友好话语，其语势之强大、内容之广泛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以涉及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丰富内容，构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苏联的美好形象，进而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以及中苏之间亲如兄弟的友好关系。为了构建这一话语，中国不仅以极快的速度建立了一个遍及全国，以介绍苏联和宣传中苏友好为主要任务的组织网络——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其分会、支会、分支会、支分会等，而且运用了几乎所有当时可以使用的话语构建手段，如讲座、报告、座谈、晚会、图片、黑板报、幻灯、电影、书刊、民间文艺形式、课堂、学习班等。在使这套话语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方面，中国政府一边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高密度地生产和传播中苏友好话语，一边面向不同的社会阶层，有针对性地构建不同的话语内容，并选择相应的话语传播方式。这一长期的、

2 新中国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1949—1960年)

全面的、触及社会各个阶层的话语构建活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树立并强化了绝大多数群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认同、支持与服从,而且塑造了一种以浓厚的苏联情结为特征的国民心理。

可以说,中苏友好话语构建既是近代以来中国广泛构建某种外国文化之先进性话语的活动之一种,具有某些普遍性的特点;又是这些话语构建活动的典型,具有许多独特之处。以它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较深入地了解1949—1960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社会状况,认识新政权和社会秩序逐步巩固的过程。也就是说,对这一现象的分析与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国家、社会、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等问题的理解。

具体地说,对中苏友好话语构建这一现象做历史学的研究既有可操作性又具有学术意义。

首先,此项研究有丰富的史料支撑。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历史学的研究而言,史料是“巧妇”之“米”。没有充足的史料,史学研究是很难展开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历史的研究而言,丰富的档案、回忆录和当时公开发行的书报是重要的资料来源。目前,1970年以前的档案资料已经基本开放;关于当代中国史的回忆录和口述资料陆续出版;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公开发行的各种出版物也大多保存完好。有关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史料可以从上述档案资料、回忆文章和各种出版物中搜集。

其次,中国内地学术界至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各种话语构建活动尚未展开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中苏友好话语的构建方面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1949年以后的中苏关系史研究投注了较大的热情,但更多的成果侧重于两国之间的国际往来,很少探讨与中苏关系密切相

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向国内民众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活动。实际上，中苏友好话语构建在发挥整合国内社会的功用之同时，又服务并附属于中苏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1949—1960年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研究不仅可以填补国内史学界在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而且可以丰富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成果。

再次，这一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今社会，信息的传输速度之快是任何“一日千里”之类的传统词语所不能表达的。各种现实社会的力量出于种种需要，利用便捷的信息传输手段在不断地构建为自己所用的话语。探讨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运作，分析国家大规模话语灌输行为的经验、教训以及它所产生的各种影响，从学理上来说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各种现实社会力量之话语构建活动的认识。

二 学术史的回顾

到目前为止，相对于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历史其他问题的研究，史学界对中苏友好话语构建活动的关注是非常有限的。关于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其一是专门性的研究论文。据笔者的了解，目前关于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专门性论文大概只有张伯庚在哈佛大学所做的博士论文《宣传与观察：苏联形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销，1950—1965》（Julian Po-Keng Chang, “*Propaganda and Perceptions: The Selling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65*”, Ph. D. Dis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1995）^①和台

^① 参见余敏玲《学习苏联：中共宣传与民间回应》，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2003年6月出刊）。

4 新中国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1949—1960年)

湾学者余敏玲的《学习苏联：中共宣传与民间回应》以及《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到中国》^①，中国内地尚没有。由于条件的限制，张伯庚的论文全文笔者一直没有读到。余敏玲的《学习苏联：中共宣传与民间回应》在对中苏友好话语构建作了轮廓性勾勒之后，主要分析了民间对这一话语的反应；但限于篇幅，它只是粗线条地勾勒，无论在叙述的系统性还是资料的丰富性方面都留有一些遗憾。《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到中国》着重分析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进入中国以后，其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形象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它从个案的角度探讨了苏联形象进入中国语境之后的遭遇，为我们探讨中苏友好话语的生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其二是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编著在有关中俄或中苏文化交流的章节中对1949—1960年间中国方面大量介绍和引进苏联文化的情况的叙述。比如，李明滨的《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编《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概览：1949—1991》^③在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时，介绍了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以各种方式对苏俄文化成果如书籍、影片、绘画、歌舞等的大量引进，以及中苏互派文化团体进行学习、交流的情况。

其三是有关1949年以后中苏关系的论著中对新中国建立初期中苏“蜜月”的论述涉及的中国国内对苏联的全面学习及对中苏友好话语的广泛构建。比如，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④对中国聘请苏联专家的情况，以及苏联专家在中

①（台北）新史学杂志社《新史学》第13卷第4期（2002年12月出刊）。

②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④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

国的工作、生活等方面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孙其明的《中苏关系始末》^①在第二章“‘蜜月’时期的友好合作”中以“全面合作与全面学习”为一节，用8000字左右的篇幅专门论述了1949—1956年间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刘志青的《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②在第七章“初度‘蜜月’（1949—1956）”中提到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成立以及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合著的《苏中关系：1945—1980》^③在第二章到第五章探讨1949—1959年间的中苏关系时，对中国学习苏联的情况做了一些分析。

从总体上说，第一种形式的成果既有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叙述，又有对历史现象的深入分析；第二、三种成果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把1949—1960年中国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作为中苏友好交流与关系的一种表现，进行了概括性的记述，分析很少。

三 研究方法、论文框架及资料来源

鉴于上述情况，本书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中国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整个运作过程进行分析，考察其话语内容、构建方式与机构等方面的起伏变化，探究这一变化的深层原因，并分析中苏友好话语构建在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中所产生的反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展开了系统化、制度化、经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

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6 新中国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1949—1960年)

常化、全国化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并在1949—1956年间把这一活动推向了高潮;从1957年开始,中苏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的分歧趋于明朗,但到1962年以前,双方都尽量克制,没有使冲突公开化和尖锐化,中国在此期间也一直没有中断中苏友好话语的构建与传播;1963年,中苏之间开始公开论战之后,中国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也全面中止了。也就是说,从完整的角度来看,新中国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始于1949年,中止于1962年。但本文为了叙述的方便,仅谈论1949—1960年间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新中国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全面认识,因为苏联1960年全面撤走援华专家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61年和1962年中苏友好话语构建几乎已经完全成为一种姿态,只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日和十月革命节期间开展有限的活动。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中苏友好话语构建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但作为一种政府传播行为,中苏友好话语构建又属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本书在对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过程、内容、特点、影响等方面做初步探讨时,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借用一些传播学的基本概念。

本书主体部分分为九章,即第二至十章。第二章简要交代1949年以前中苏友好话语构建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苏关系及国内情况的变化,中苏友好话语构建在1949—1960年间表现出较强的阶段性特点:1949—1952年间,中苏友好协会的各级组织创建并迅速发展起来,全国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活动搞得轰轰烈烈,颇有声势;1953—1956年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在强调中苏深厚友谊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中国建设的现实需要,大力宣扬“全面学习苏联经验”;1957—1960年,中苏冲突与分歧趋于明显,新中国政权也已基本渡过了最艰难的立足

期，中苏友好话语构建迅速淡化。为了比较充分地展示 1949—1960 年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具体情形，为进一步分析做扎实的铺垫，本文第三至五章分别就 1949—1952 年、1953—1956 年、1957—1960 年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操作展开较详尽的论述。第六章在第三至五章讨论的基础上，着重分析 1949—1960 年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特点。第七章通过分别叙述针对农民、工人、妇女、青少年构建的中苏友好话语，来展示中苏友好话语构建如何发挥整合社会的功用；第八、九章讨论 1949—1960 年中苏友好话语构建活动不断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第十章探讨中苏友好话语构建在各阶层群众中产生的不同反响。

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本文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档案资料；1949—1960 年代公开发行的书刊资料；方志资料；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版的回忆录。

在档案资料方面，笔者主要选取江苏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汉中市档案馆、汉中市汉台区档案馆、陕西省城固县档案馆和眉县档案馆，分别作为省级、市级、县（区）级代表，查阅了它们所收藏的中苏友好协会组织与宣传部门（由于 1953 年以后，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归由各级宣传部门领导，所以中苏友好协会的部分资料被收存在各级宣传部门的档案中）1949—1960 年间的档案，以及各种党内刊物。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陕西和江苏既不像北部省区那样和苏联接壤，又不像南部的一些省区那样远离政治中心，所以它们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活动可以反映全国的一般情况；同时，这两个省区分别位于东部和西部，从点的选择上来说，它们也比较有代表性。从江苏省和陕西省的情况来看，省级档案馆保存的中苏友好协会的档案资料相当完整，其中不仅有来自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中苏友好协会的全国性组织）与直属总分会（包括几个省、市的大区级中苏友好协会组

织)的各种通知、指示,而且有中苏友好协会分会(省及直辖市的中苏友好协会组织)对其下属的支会、支分会所发的各种具体工作安排与群众活动材料。在市、县(区)级档案馆,中苏友好协会的档案资料相当零散,除了保存有一部分上级友协的通知与指示性文件外,主要是该级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计划与总结。从一定程度上说,省、市、县(区)级档案馆所存中苏友好协会各级组织的档案可以比较完整而系统地反映1949—1960年间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情况。同时,各级宣传部门档案中的群众活动工作安排、思想调查、动态类材料对中苏友好活动的情况及其在群众中引起的反响有所反映。党内刊物是档案馆以“资料”的方式保存的重要史料。相对于公开发行的书刊而言,它们对信息的控制颇为宽松,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从其中的宣传类和思想文化动态类刊物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宣教动态》《宣传通讯》《宣传工作》,新华通讯社编的《内部参考》,文化部办公厅编的《文化动态》,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编的《思想界动态》等之中,也可以淘洗出关于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有用信息。

1949—1960年间公开发行的各种群众性书刊也是本文的重要资料来源。书刊是一种信息载体。1949—1960年,尤其是1954年以后,国内的各种报刊从创办到编辑、发行都在中国共产党的严格统一领导之下,是“开展经常的群众政治工作”的重要工具;各级党委机关报更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①无疑,它们的内容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是符合党的意志的。因此,从1949—1960年间公开发行的书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

① 《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1954年7月1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论党的宣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各种出版物想要向民众传播什么样的信息，构建什么样的话语。笔者查阅的公开刊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以构建中苏友好话语为主旨的刊物，如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中苏友好》，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的《中苏友好手册》《苏联知识》，中苏友好协会南京分会的《中苏友声》，苏联编辑并向中国发行的《苏联妇女》《苏中友好》等；一类是对各阶层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宣传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为主旨的刊物，如《新中国妇女》（后改名为《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学生》《时事手册》《宣传手册》《歌曲》《人民日报》等。第一类刊物可以反映中苏友好活动的基本状况；从第二类刊物中，可以看出不同阶段中苏友好话语构建活动在整个国家活动中所占的分量。

方志资料中有关中苏友好活动的内容展示了中苏友好话语构建在不同地域的开展情况。与苏联接壤的北方各省区的中苏友好活动自然为全国之先，所以笔者在中国中部与南部各省中选取了几份方志作为考察对象，如《河北省志》《河南省志》《山东省志》《江苏省志》《浙江省志》《湖北省志》《广西通志》《云南省志》《四川省志》等。

近年来出版的回忆录和传记，为我们了解1949—1960年中苏友好话语构建对个体生命与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较多地运用了更具个体特色的回忆录资料，如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王觉非《逝者如斯》、吕大渝《一位共和国第一代女电视播音员的自述》、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吴冠中《望尽天涯路：吴冠中回忆录》、马嘶《负笈燕园1953—1957：风雨北大》等。

应该说明的是，由于条件的限制，本文几乎完全以中文资料为基础，欠缺对俄文资料的使用。这虽然不会对本文的结论产生

多大的影响,但毕竟在资料的全面性上是一个缺憾。

四 基本概念の界定

在具体讨论中苏友好话语构建之前,有必要对本文所涉及の几个重要概念做简要の界定。

话语、话语构建、宣传是本文最基本的概念,论文の主体论述就是以它们为基点架构起来的。话语(discourse),是一个近年来在不同学科被广泛运用的术语。美国约翰·费斯克等编撰の《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在提到这一术语时,认为:“这个术语用在语言学中以指称比句子更重要的动词性言说(verbal utterances)。话语分析关心的不仅是某个言说者の复合语句,常考虑的是两个或更多言说者の交替互动,以及用来操持和控制特定语境中之话语的语言规则与社会习俗。”^①在本书中,话语是指特定语境下结构化的、相互关联の一整套言说,它同时指涉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中苏友好话语指在1949—1960年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自己的需要,面向中国内地民众所生产与传播的一系列以中苏友好为核心内容的言说与叙述。

话语构建是指通过一定的方式与渠道,有意识地生产、传播具有特定内容、特定表达方式的话语。在这一概念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话语生产与传播活动的有意识性,即它是活动主体的主动行为;其二是它主要包括话语的生产与传播两个方面,即话语怎样生产出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与渠道传播、传播

^①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4—86页。